六科给事中制及对明代政治体制的监控和调节

张 薇

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,在明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其重要特点之一,就是作为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监控、调节系统日臻强化和完善。六科给事中制对国家政治决策和执行机构,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监控作用,成为明代政治体制内部自我调节的重要环节,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。研究明代政治体制的这种自我监控调节机制,对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,可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。

(一)

给事中这一官制属于谏言、监察系统,几乎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。它产生于秦汉时期,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,明代是这一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。明初太祖朱元璋为强化皇权,吸取了历代、特别是元王朝覆没的历史教训,革除了丞相制,分相权于六部,但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,因而将给事中对应六部,分设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,官员多达58人,各科设都、左、右给事中各1人,给事中各科名额不等。六科不隶属任何部门而独立地直接向皇帝负责,以监督六部及百官。很显然,六科给事中为“国家毗倚甚重”^①,地位显要。

正因为六科给事中有这种特殊的作用和地位,明代对给事中的选拔是很严格的。一般必须具备如下条件:

(1) 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。首先,必须具备一心忠于皇帝的坚定立场。按照朱元璋的要求,给事中必是“忠谏之士”^②。甚至要为皇帝不惜自己的性命,“必国而忘家,忠而忘身之士,方可任之”^③。其次,要有较深的伦理道德修养,充任给事中之职者,一般对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有较深的造诣,封建正统观念根深蒂固,“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”^④;“不爱富贵”而“惜名节”^⑤。那些“患得患失之徒”、“爱身固禄之流”^⑥是绝对不能充任的。其三,要气节刚直,为官正派,不仅“内存忠厚之心”,而且“外振正直之气”^⑦;“必出词吐气,宁直勿倚,宁厚无刻”^⑧。“虽冒艰危,既抗言而无忌”^⑨，“必负刚方端鲠之节”^⑩者为之。

(2) 要有突出的学识才干。一是要有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。给事中一般都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,同时又处于这些方针政策实施过程中信息反馈的中枢要津,掌握从朝廷到百姓的各种动态,没有相当的治理才干和政治洞察力,就很难驳正朝政违失,提出治国安邦的方略。所以,给事中必备“识达治体知恤民”的才干,才能“献纳平允,足以弼化理”^⑩。二是要有渊博的文化知识。给事中劝谏君主,驳正违失,往往引经据典,或以前代兴亡沉浮的历史为鉴,或以当今国计民生为要,从古至今,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

等无不涉及，而且以草章书奏为工作的重要手段，所以必须“器识远大，学问该博”^⑫，通古今，善文章。三是要有善辩的口才。给事中身居言路，常与皇帝对话，又时时论是非、辩真伪，往往身处唇枪舌剑的激战中，没有雄辩的口才，无法胜任。所以必须口舌灵利，善言者，“始授台谏”^⑬。

(3) 要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。按明制规定，充任给事中之职者，一般是“在各衙门办事进士，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、博士并推官、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”^⑭。他们一般都有在基层任职的经历，积累有仕途经验，深谙封建官僚制度的法规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办事效率。

此外，也要求有外表体态美，“必选体貌端厚”^⑮、“姿貌雄伟”^⑯者。

总之，以言为职的给事中，必须善辨是非，敢论曲直，“不可不公，不可不核实，不可不稽古，不可不通世务近人情”^⑰；还“必廉、必勤”^⑱，“必身、言、书、判皆善”^⑲，具备这般的品行才识，才能称职。这些选拔条件，基本保证了给事中在明代(主要是前期)百官中具有较高的素质，成为他们肩负重任的基础。

(二)

明代六科给事中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，担负着不可忽视的监控调节职能。

(1) 钞发章疏，驳正违误。凡六部向皇帝奏请的章疏，须经由给事中审查，凡内廷下达诏旨，“必先下某科抄出送部，事有不可，科臣抄参过部，部即据参停寝，或据参奏覆”^⑳。一般“大事覆奏，小事署而颁之。”^㉑凡是出入的章奏诏旨，“有所遗失、抵牾、更易、紊乱”^㉒，即可驳正缴还重拟。给事中握有政令下达之前封驳这一重要环节，防止不适当或错误的政令下达，协助皇帝把政策关。对此，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过：六科给事中“掌封驳之任，旨必下科，其有不便，给事中驳正到部，谓之科参，六部之官，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，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。万历之时九重渊默，泰昌以后国论纷纷，而维持禁止，往往赖科参之力”。^㉓这一评价颇切实际。应该看到，给事中的这一职能对明王朝在较长时期内，仍然保持一定生机，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。

(2) 侍从规谏，拾遗补阙。给事中为皇帝的近侍，在皇帝临朝时，“立殿左右，珥笔记旨”^㉔。成祖时就明确规定：“拾遗补过，近侍之职。自今事之丛脞者，尔等当悉记之，以备顾问。所行有未合理，亦当直谏”，“勿有所顾避”^㉕。

明初六科给事中就朝政大事，于殿廷内外，均可“与天子争可否，辨是非，正笏危论”^㉖。君臣之间，询谋畴咨，互相可否，以求至当”^㉗。可见，给事中不仅是皇帝的一般近臣，而且负有规谏失当的重任。

(3) 朝政有失，建言匡救。给事中不仅有参预议政权，而且还有纠谬正误权。他们可参加“廷议”，当举行朝廷最高首脑会议，决策有关重要人事安排、刑狱大案、财政经济、军事边防、外交关系等大政方针时，均由“部院官陈述始末，内阁辅臣即拟可否”，“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。如诸臣陈述未详，议拟未当者，许公同评正”^㉘。

他们可上疏陈言，既可在朝廷上“露章面奏”，“以面析其是非”；又可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封章呈上，“退上封事，以详析其可否”^㉙。“各科或单疏专达，或公疏联署奏闻”^㉚。事无巨细，俱可疏奏。可见，对朝政违失，六科给事中可以行使建言匡救之职权。

(4) 稽察百官，弹劾奸佞。六科给事中负有对六部百司的日常工作进行稽察的职责，对

六部实施国家政务的全过程要作详尽的记载，并形成档案，定期注销。同时还监察文武百官，“凡两京大臣方面等官，有不职者”，“有不公不法等事”，“俱得劾奏”。“假以陈言希进，市恩报怨及纷更旧法者，参驳究治”^⑳。举劾的形式，可以“各陈所见，或公同举奏”^㉑。这一职能对于维护封建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(5) 参预铨选，考核群臣。明代选授官吏，“文归吏部，武归兵部，而吏部职掌尤重”^㉒。吏科、兵科必参与吏部、兵部日常铨选文武官吏，对各衙门推举、保举官员也要进行监督。“凡吏部推升官员”，“若将才力不及”者“朦胧奏升有司”，吏科劾奏；“凡内外衙门及巡抚巡按等官，保举官员未当”，以及“滥保市恩者，俱听本科参出，请旨究处”^㉓。凡选用重臣，不由吏部专权，往往采取廷推的方式，六科都给事中参加廷推，有权推举候选人，如不同意被推选的大臣，还可行使否决权。

同时，给事中还要监临科举的全过程，在乡试中充任考试官，在会试、武举中任同考官，殿试时任阅卷官。科举考试过程中如出现询私舞弊现象，给事中还可随时予以纠劾。

考核在职官员，文官由吏部和都察院主持，给事中也要参预监督。当外官三年、京官六年考察之际，“大臣自陈，去留既定，而居官有遗行者，给事、御史纠劾，谓之拾遗。拾遗所攻击，无获免者”。官员往往“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”^㉔。很显然，给事中对选拔考核官吏有监督作用。

(6) 监审狱案，察理冤抑。给事中有权参与三法司会审、判决重大案件，还有权监察刑部受理的所有上诉案件。三法司已判死刑的罪囚，行刑前须经刑科最终复审，“遇决囚，有投牒讼冤者，则判停刑”，由“刑科三覆奏，得旨行刑”^㉕。

明代由皇帝直接指挥的锦衣卫、东厂等御用特务机关，其权力超过三法司。然而给事同样有权监督厂卫。凡厂卫缉捕、廷杖、处决囚犯，必经给事中签驾帖。这对厂卫滥用职权，横行肆虐，陷害无辜有所钳制。

给事中还轮值登闻鼓楼，及时上达冤案。凡有申诉冤枉，或陈告机密重情者，许击登闻鼓，值鼓官“受状具题本封进”^㉖，“以伸理冤抑，通达幽滞”^㉗。

给事中对执法部门的这种监督纠察，有利于防止滥刑，保护善类。

此外，六科给事中还掌朝参门籍，入坛陪祀，奉命出使，册封宗室、诸藩，告谕外国，出巡抚安军民，赈济灾民，监军纪功，监工营建，署理黄册等等。

六科给事中的这些职能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监控系统，成为封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(三)

六科给事中制度，对明代统治系统进行监控调节，平衡政治、经济诸方面关系，保证庞大的官僚统治机器能够按照封建制度的运行轨迹正常运转，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。

第一，这一制度极力维护统治集团整体的长远利益，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。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君主极端集权，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混为一体，国家意志被个人意志所代替。因此，皇帝个人的言行，对社稷的整体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。然而，明中叶以后，皇帝大多不务朝政，或整日求神拜佛；或不惜民脂，搜集天下珍物；或犬马猎狩，南巡北游；或歌舞宴乐，醉生梦死；或任用奸佞，残暴昏庸，朝政颇多失误。这在给事中看来，是违背了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原则的，对封建王朝的稳固性极为有害。所以“他们为皇帝亲操政柄，实行

直接统治，作了不懈地努力，往往不顾祸福，直言谏诤，并有所奏效。在世宗即位时，给事中夏言疏请皇帝“日视朝后，御文华殿阅章疏，召阁臣面诀”^⑳。世宗听取了这一谏言，在当政的头一、二年里，革除武宗朝弊政，因而曾一度出现了图治新政的局面。

同时，给事中对危害皇权的行为极其警惕。他们借鉴历朝衰亡的教训，极力反对宦官、大臣专权，防范皇权旁落。明代宦官曾几度专柄国政，造成严重祸患。正统时，王振“挟帝亲征”蒙古瓦剌军，英宗被俘，造成明朝空前危机。在京师的给事中带头讨伐王振党羽为“奸党，罪当诛”^㉑，清除了宦官势力。成化时，宦官汪直得势，给事中李俊、王徽、王渊等众人纷纷上言，要求限制宦官权力，“不许在外管军”，“置立田产房屋”^㉒等。在武宗朝宦官刘瑾专权时，给事中群起而攻，反对更为剧烈，严厉谴责“群奸欺蔽之罪”^㉓。至于天启时，权及顶峰的魏忠贤，在用事六年中，给事中始终极力弹劾，直指“罪在不赦”^㉔。可见，给事中对宦官弄权误国，确实切齿痛恨，水火不容。

明代名无宰相，但实有相权的内阁首辅，往往对皇权产生威胁。当首辅专柄时，给事中也决不等闲视之。最为典型的是嘉靖朝严嵩专权二十年间，给事中的反严嵩斗争从未停止过。他们痛斥严嵩父子“同恶相济”^㉕，干尽坏事，极力弹劾，为此而遭残害的就有周怡、厉汝进等多人。

纵观明代，给事中维护皇权的斗争，确有一定成效。在200多年的统治中，虽曾几度出现过皇权旁落，权宦权臣一度专国的现象，但始终未能重演篡夺皇位的历史闹剧。就以皇权旁落而言，主要是皇帝本人不务朝政所致，并非他人抢权而为。因此，中央集权制得到相当强化。这与给事中制造维护皇权的强大的政治舆论和气氛，并不断对违纲枉法者行使弹劾权，对权臣权宦产生很大的抑制力是有直接关系的。

第二，反对奢腐，澄清吏治。明中叶以后，随着统治的巩固，社会的安定，经济的发展，统治集团中的贪图安乐风气渐盛，奢侈腐化现象日深，对此，给事中持反对态度。成化时，给事中毛弘上疏直言“愿省游戏、宴饮之娱，停金豆、银豆之赏”，被宪宗“嘉纳之”^㉖。正德时，武宗不仅在京专设“豹房”，以供宴乐，还动辄兴师动众，江南塞北游猎扰民，给事中一再上疏“请省国用，以节民财”^㉗。穆宗以“费数十万貲”^㉘，搜集天下好玩，奇珍异宝，给事中陈吾德等曾多次提出了批评。

应该指出，给事中反对官僚统治集团的奢腐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地主阶级官僚集团的一部分，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得利者和拥护者。他们所反对的，仅仅是那些当时社会所不能承受的“超负荷”的奢侈，而力图使皇帝及官僚不致过度地腐败下去，保持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得以基本平衡，以保证有足够的活力，来长久地占有统治地位，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和动力。当然，他们不可能最终阻挡住这一发展趋势。然而大量地耗废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对于人民和国家毕竟是沉重的负担。因此，给事中反对官僚集团奢侈腐化，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也是不无裨益的。

明代的吏治，实际从永乐后期便始趋于蹙，成化时吏治腐败更为明显，正、嘉之际已相当严重，到了万历，便土风日下，一泻千里，成为不可挽回之势，给事中对这痛心疾首，予以抨击，以图整肃吏治。

一是反对仕途不公，官吏冗滥。景泰时，可以物买官，“输豆四千石以上，授指挥”。给事中林聪、曹凯等人反对这一“以生民膏血养无功子孙”^㉙的政策，被皇帝采纳。成化时，给事中王瑞等提出要消除“冗员淆乱仕路”之弊，“以存国体”^㉚。促使皇帝在3天之内就处罚了对此负有责任的13个大臣。

二是反对权臣以权谋私，败坏吏风。嘉靖时大学士桂萼等人收纳重贿，赠官送爵，受王琼“贿遗钅万”后，将其起用为尚书。他们还结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将亲戚和“柔和善逢”之辈安插于朝廷上下。给事中陆燾等人对他们“专权招贿，擅作威福”的祸患，予以有力的抨击，终使世宗“大感悟”^{⑤0}，罢了桂萼、张璁的阁臣职务，这是给事中在澄清吏治方面的一次很有成效的斗争。

三是反对贿赂公行，贪赃枉法。万历时，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指陈内外官员串通一气，“交通赂遗，比周为奸”之弊，建议禁止朝觐官员馈遗，“帝善其言，勒所司禁之”^{⑤1}。正德期间，给事中熊浹授命“出核松潘边饷”，处理了副总兵张杰“赃累钅万”，并“箠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”^{⑤2}的巨大贪污枉法案。给事中对监督和察核各级官员贪污纳贿，违法乱纪方面，确实起过实际作用。尽管他们不可能根除或扭转封建官僚的这种堕落之风，但对其毕竟是一种打击或制约，对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第三，反对暴政，打击邪恶势力。施行残酷的特务专政，是明代专制集权的一个重要特点。它对明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。给事中对厂卫特务的骄横无度，残害无辜，灭绝人性，超越法规的暴行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。成化时，皇帝为监视和镇压朝臣与百姓，增设了由权宦汪直掌管的西厂，特务们为非作歹，“贼虐善良”，干尽坏事。对此，给事中痛恨切骨，在汪直出镇大同之际，六科十三道交章弹劾汪直“苛察纷扰，大伤国体”^{⑤3}的罪行，要求罢除西厂，朝廷内外形成众口一词。在群臣压力下，宪宗才罢除了西厂，消除了朝政一大祸害。天顺初，给事中金绅首先偕同官弹劾锦衣卫指挥门达，疏论其“窃弄威福”之罪，使之“坐滴戍边”，“天下快之”^{⑤4}。万历初，厂卫继历朝余弊，“滥受民讼”，而且继续使用枷刑法，“犯者立死”，给事中孙玮“极陈其害”，结果将东厂办事官郑如金“坐下诏狱”^{⑤5}，使目无法纪的特务受到了惩处。

给事中反对厂卫特务暴政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官僚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，保证封建制度的正常秩序。事实上，他们保护了一批无辜的朝臣和百姓，打击了最邪恶的势力。这有助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基本平衡，对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大的震荡，产生了制约作用。

第四，反对强取豪夺，为民争利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给事中同情民众饥贫，主张调整苛刻的赋税，减轻过重的负担。成化时，朝廷官僚队伍已极为膨胀，仅在京师的四方游僧就有万数，而且为供官僚玩赏，养活着大批珍禽异兽，冗费日增，导致物价暴涨，民不聊生。给事中丘弘上言，要求驱逐僧道，放纵禽兽，“以省冗费”，并“请发太仓米，减价以糴，给贫民最甚者。”^{⑤6}一度获得实施。万历时，给事中极力反对“矿税之害”，自十七年（1589）始，给事中包见捷、金世衡、王元翰、田大益等人多次上言，惊呼“榷税使者满天下，致小民怒声彻天”^{⑤7}。他们早就预示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，必将引起社会动乱，强烈要求“尽罢矿税”^{⑤8}。事实证明，他们是具有远见卓识的。二十七年（1599）爆发了湖广市民反对税使陈奉的斗争，直到三十四年（1608）云南万余矿工的暴动，在八年期间，全国各地城镇市民及矿工纷纷揭竿，捉杀矿监税使，天下动乱。在这一斗争中，给事中与市民、矿工及农民站到了一边，实际上对朝廷推行这一政策起到了内外夹攻的作用。这对人民的斗争是有益处的。当然，他们的出发点同人民是截然不同的，他们对人民仅仅是同情其穷困，而不支持其造反，担心苛刻盘剥会引起激变，损害明王朝的根本利益。所以主张调整与人民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，以便更长久地统治下去。同时，每当发生天灾时，给事中尚能体察民情，每每向朝廷谏言，请求赈济。景泰初，给事中叶盛奉命赴河南安顿流民回京的途中，见到顺天等八府

因累年蝗灾，久旱不雨，禾麦枯干，农民扒草根充饥，大量逃亡的情景，便奏求赈济、安抚，得到朝廷应允^⑤。又如，为了使灾民能真正得到实惠，防止地方政府和官吏中间盘剥，英宗时的给事中姚夔曾谏言，发放赈济时，天下诸司“必躬勘察，先给其最贫者。”这一建议得到朝廷批准，“立命行之”^⑥。对那些贪污挥霍赈济粮款，大发灾难财的官吏，给事中主张坚决打击。永乐时，给事中王彰、王励等人奉命出巡到河南，将因水灾“民多流亡”，而“长吏不力恤”的情况向朝廷报告，结果罢处了“贪刻者百余人”，并“招复流民，发廩赈贷”^⑦，平息了民愤。

给事中还反对豪强夺田，力求保障民业。明中叶以后，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，尤其是皇庄胃口最大。天顺八年(1464)朝廷籍得权宦曹吉祥的土地，设置皇庄时，给事中齐庄就提出，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何必与民争利？”^⑧坚决反对置皇庄。嘉靖时，给事中夏言出使勘察庄田，看到各类庄田造成的危害，明确提出“革除皇庄、皇店、皇盐”^⑨的主张。同时，皇亲国戚，达官内宦侵蚕民田之势也不逊色。所以，成化时，给事中丘弘再三要求坚决杜绝“权贵请乞”私田，并严厉指责他们“欲壑难厌”^⑩，名为奏求，实为豪寺。宪宗采纳了这一意见，并宣布“自今请乞，皆不许，著为令。”^⑪

当然，给事中并不反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，反对的只是巧取豪夺，过分压榨。他们唯恐剥削程度超出农民的“承受能力”，而导致农民的激烈反抗。这一主张，客观上一定程度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，缓冲了阶级斗争的激化，对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不无有益，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农民的反抗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。

第五，勾通上下，联系朝野，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。在科学技术落后，信息收集和传递手段还处于相当原始状态的明代，言路是向统治中心输入大量信息的重要途径。给事中居言路，处于上传下达的要津，故掌握一定的信息量。“国家有利害，生民有得失，大臣有奸慝”^⑫，他们均可获悉，并直达皇帝而不受阻塞。如重大天灾，紧急民情，边陲安危，以及诸藩顺逆等情况，不少都是通过给事中上达朝廷的。正德十四年(1519)宁王朱宸濠准备叛变的消息，就是通过这一渠道传导上达的。当时盘踞江西南昌一带的宁王蓄谋已久，企图举兵叛乱，争夺皇位。给事中熊浹与御史熊兰将此情草奏上报^⑬，结果，促使朝廷在宁王还未成势之际便将其镇压，阻止了一次动乱。又如万历九年(1581)给事中傅作舟疏报大江南北灾情严重，“民多乏食”之状，首辅张居正就是以此为据，劝神宗“量入为出，加意撙节”，促使皇帝作出“宫费俱节，赏赉不溢”^⑭的决定，以节省财政费用，赈济灾民。可见，给事中传递信息，为最高统治中心提供决策的依据，同时又反馈各级执行政令的状况，对明王朝统治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不愧为朝廷“通天下之情”的耳目。

在明代，给事中的作用也有另一面。一是身陷门户之争，充当党同伐异的鹰犬。在嘉、万以后，统治集团内部门户角立，给事中纷纷投靠门户，摇唇鼓舌，攻讦异党，相互厮杀。这种门户之争，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衰退的速度，使明王朝彻底失去了回天之力。二是重于空谈，轻于实政。到明后期，言路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给事中对朝廷的责任心有所淡漠，而浮躁空谈的风气却盛行起来。他们脱离现实，海阔天空，夸夸其谈。章疏“往往过于修饰，过于冗长，过于奇僻，过于隐秘”^⑮。文风飘浮，虽侃侃而谈，却无济于事，对无关紧要的事情争论不休，“天下竟为虚文所束缚”^⑯。

给事中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及自身素质的下降所致。他们中有的慷慨陈词，“务为危言激论，以自标异”^⑰，想的是沽名钓誉；有的气势汹汹，咄咄逼人，为的是在门户之争中取胜。给事中的这些消极作用，既是给事中制度自身局限性的结

果，也是他们阶级属性的外延，是不可避免的。

(四)

纵观明代，有作为的皇帝凤毛麟角，而大都是溺于贪乐的无能之辈，然而，皇权却固若泰山，朱姓天下延续了近300年。原因何在？显然，封建制度内部的机制起了重要作用。其中，六科给事中制度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节作用是不可忽视的。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历史的启示：

第一，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中，必须注意健全强有力的监控调节机制。当明代的这一机制正常发挥作用，使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被限制在社会政治、经济关系所能承受的能力之内时，政治的清明度就高一些，社会各种矛盾就缓和一些，统治系统尚可正常发挥职能，否则相反。强有力的监控调节机制，是社会自身平衡发展的重要保证。

第二，国家政治制度中的监控系统，必须与民主制度相依存，并以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气氛作为保证。封建专制的极端独裁性，集中地表现在对民主的根本否定上，对监控机制发挥作用带来最大的威胁。

第三，国家政治制度中的监控调节机制必须法治化。明代这一机制的致命弱点是没有法律的保障，给事中的职责和权力得不到保护，连自身的人权也常常遭到摧残，这是他们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第四，国家政治制度的监控调节机制，必须具备健康的素质和完善的职能。应围绕对国家政权机关和各级领导层的监督为中心，要有科学的机构设置和明确而恰当的职权范围，监控调节机构的人员必须训练有素，一身正气，具有真才实学和相当的工作能力。

注释：

- ①③⑥⑧②② (明)孙承泽：《春明梦馀录》卷25，《六科》。
- ② (明)余继登：《典故纪闻》卷3
- ④⑩ (明)肖彦：《掖垣人鉴》卷2，《两朝谏训》。
- ⑤ (明)黄训：《皇明名臣经济录》卷18，丘浚《重台谏之任二》。
- ⑦⑪ (明)张萱：《西园闻见录》卷93，《台省》。
- ⑨ (明)孙旬：《皇明疏钞》卷25，詹仰庇《纳忠言罢采办以纾国计疏》。
- ⑩ 《掖垣人鉴》附录
- ⑫⑮ (明)陆容：《菽园杂记》卷7
- ⑬⑲ (明)张瀚：《松窗梦语》卷8，《铨部记》。
- ⑭ 《明会要》卷37，《职官九·六科》。
- ⑯ (明)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11，《选科道》。
- ⑰⑳ (清)阎尔梅：《徐州二遗民集》卷9，《谏官论》。
- ㉑ (明)薛三才：《薛恭敏公奏疏》卷2，《礼垣》。
- ㉒⑳㉓㉔㉕㉖ 《明史》卷74，《职官志三》。
- ㉗ 《日知录集释》卷9，《封驳》。
- ㉘ (明)徐学聚：《国朝典汇》卷29，《求言纳谏》。
- ㉙ 《皇明名臣经济录》卷2，刘定之《题建言事》。
- ㉚ 《典故纪闻》卷18
- ㉛ 《皇明疏钞》卷7，胡应嘉《重延纳广聪明以隆新政疏》。

- ③④⑤⑥ 《明会典》卷213,《六科》。
- ⑦ 《国朝典汇》卷42,《论劾》。
- ⑧ 《明会典》卷178
- ⑨ 《明史》卷196,《夏言传》。
- ⑩ 《明史》卷177,《王炫传》。
- ⑪ 《典故纪闻》卷14
- ⑫ 《国朝典汇》卷30,《建言》。
- ⑬ (清)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卷13,《魏大中传》。
- ⑭ (清)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54,《严嵩用事》。
- ⑮ 《明史》卷180,《毛弘传》。
- ⑯ 《西园闻见录》,卷93《建言上》。
- ⑰ 《明史》卷215,《陈吾德传》。
- ⑱ 《明史》卷164,《曹凯传》。
- ⑲ 《明史》卷180,《王瑞传》。
- ⑳ 《明史》卷206,《陆燧传》。
- ㉑ 《明史》卷241,《钟羽正传》。
- ㉒⑳ 《明史》卷197,《熊浹传》。
- ㉓ (明)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卷92,《中官考三》。
- ㉔⑳ 《西园闻见录》卷93,《六科》。
- ㉕ 《明史》卷241,《孙玮传》。
- ㉖⑳⑳ 《明史》卷180,《丘弘传》。
- ㉗ 《明史》卷236,《王元翰传》。
- ㉘ 《明史》卷237,《包见捷传》。
- ㉙ 《明史》卷177,《叶盛传》。
- ㉚ 《明史》卷177,《姚夔传》。
- ㉛ 《明史》卷160,《王彰传》。
- ㉜ 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,第156页。
- ㉝ 《明经世文编》卷202,《夏文愍公文集》。
- ㉞ 《明史》卷15,《孝宗本纪》。
- ㉟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1,《江陵柄政》。
- ㊱ 《明史》卷248,《梅之焕传》。
- ㊲ (清)赵翼: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35,《明言路风气先后不同》。

(上接108页)

“不含机心”是蒲松龄所向往的人性境界。这在那些描写人与狐鬼精魅交往的篇章中,表现得尤为显著。“不含机心”者,与狐鬼也能鱼水般融洽地生活;反之,定会受到惩罚,或结局难堪。《葛巾》中的常大用,癖好牡丹,却不够旷达。牡丹花精葛巾、玉版幻化的女子与他和其弟大器成婚后,感情和谐,“家又日益富”;遗憾的是,常大用机心太重,他根据种种疑点判断二女可能是“花妖”,于是多方试探。结果是悲剧性的:

女(葛巾)蹙然变色,遽出,呼玉版抱儿至,谓生(常大用)曰:“三年前,感君见思,遂呈身相报;今见猜疑,何可复聚。”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,儿堕地并没。生方惊顾,则二女俱渺矣。悔恨不已。

与此形成对照,《黄英》中的马子才在知道黄英是菊精后,无丝毫疑忌,反而“益爱敬之”,所以能始终保持幸福的家庭:生一女,“后女长成,嫁于世家,黄英终老,亦无他异”。

注释:

- ① 《聊斋志异》卷九。
- ② 《聊斋文集》卷五。
- ③ 《聊斋诗集》卷三《送喻方伯》。
- ④ 《聊斋志异》卷十《葛巾》。
- ⑤ 《琅嬛文集》卷五《五异人传》,岳麓书社1985年7月版。
- ⑥ 《郎玉柱》但评。